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资本理论体系： 基于国家力量与传统文化视角

苏娇妮 陈捷 陈梓涵

【摘要】 社会资本是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元素，能促进社会互利行动与良性合作。既有的社会资本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理论体系展开的。然而，社会资本的概念及现实应用却不可避免地受特定文化与制度等结构性要素的影响。为了推进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的运用，需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差序格局”等理论视角探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本理论体系，着重分析特定政治制度与传统文化对于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在中国，国家力量通过制度制定、组织结构与思想引领等不同方式重新激发并塑造社会资本，形成了以党政权力为纽带的权威关系、权威信任与权威规范，凸显了纵向调控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合作。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也丰富了社会资本的文化内涵，生成了以血缘为核心、以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塑造了社会资本中的差序关系、差序信任与差序规范，体现了专属于中国人的行为与习惯特色。鉴于此，这需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本新概念，分析社会资本中国化的新特征与功能，为推动社会资本理论的中国化、本土化发展提供理论铺垫。

【关键词】 社会资本；国家力量；传统文化；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 D63；D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4769 (2025) 02 - 0058 - 13

一、问题提出

社会资本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包括了民众客观的社会网络和组织，以及主观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①在自然状态下，社会资本代表着一种实际或潜在的资源，是存在于社会关系

【作者简介】 苏娇妮，深圳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广东 深圳 518118；

陈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深圳 518172；

陈梓涵，曼彻斯特大学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英国 曼彻斯特 M139PL。

【基金项目】 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一般课题“中国特色社会资本在打造城市文明典范中作用的研究：基层社区共治的视角”（IGUC23C006）；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规划基金项目“社会资本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基层治理的机制研究”（22YJA840002）；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公众对环境政策支持的研究——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证调查”（2023A1515010768）；深圳市哲学社科规划项目一般课题“社会资本在推进深圳社区基层共治中的作用研究”（SZ2024B028）

① 陈捷、卢春龙：《共通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中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中的非金融资源^①，有重要的社会联结与互动功能^②，影响着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

社会资本的功能鲜明，但其概念及应用却相当复杂。^③自社会资本理论兴起至今，学界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及特征的界定至今争议不断^④，尚未形成定论。^⑤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⑥，且受社会环境、文化与制度等结构性要素的影响。^⑦无论是社会资本概念本身，还是社会资本在特定结构中的特征都值得关注和研究。

令人遗憾的是，既有的社会资本研究多是以公民自治与平等互动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体之间的自发联系与自由协作，以此分析社会资本的实践应用及作用机制。^⑧但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特征不同，中国有独特的国家治理特征与历史文化传统。中国有着单一制集权体制，国家对经济、社会有着全方位干预^⑨；同时，传统习俗、宗教、规范等文化与价值观念深刻嵌入了民众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持续、稳定地影响着社会交互模式。^⑩这表明，在此背景下，社会资本生成与运作的前提条件及环境与西方社会不同，这会影响社会资本的表征与功能。正因如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本理论与知识体系尤为必要。既有的社会资本研究应跳出西式背景与前提，寻求新的理论观照与现实回应。其中，中国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元素。国家力量与传统文化如何影响社会资本，根植于中国土壤的社会资本又存在哪些特征与功能？这些都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议题。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本文将结合“国家与社会关系”与“差序格局”等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资本理论体系，分析政治制度与传统文化两维因素的作用逻辑，形成中国特色社会资本的新概念，以此推动社会资本的中国化、本土化研究和应用。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争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快速兴起与发展，以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为代表的学者开启了社会资本的基础理论研究。^⑪布迪厄认为资本有经济、文化等多种形式，社会资本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和非金融性资源网络。林南（Nan Lin）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的资源和关系，行动者能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它具有功能属性。^⑫基于此，国内外学者逐渐拉开了社会资本研究的序幕。

与可直接观测得到的诸多变量不同，社会资本是一个内涵丰富、多维的潜变量。这使得学术界对社会资本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与认识，也衍生出了诸多衡量标准、类型划分和解释框架。有研究基于认知与结构来衡量社会资本，其中信任与行为规范属于认知，社会交往和参与网络属于结构。^⑬也有研究拓展

① Paul S. Adler and Seok-Woo Kwon, "Social Capital: 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7, no. 1, 2002, pp. 17-40.

② 燕继荣：《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投资——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解释》，《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③ Daniel P. Aldrich and Michelle A. Meyer,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59, no. 2, 2015, pp. 254-269.

④ 梁玉成、张琦：《城市居民的体育锻炼模式与集体社会资本——一个异质社会空间的视角》，《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⑤ 边燕杰：《论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

⑥ 边燕杰、郭小弦、李晓光：《市场化与社会资本的变迁：1999—2014》，《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⑦ 陈斌开、陈思宇：《流动的社会资本——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移民就业？》，《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

⑧ 张冉、王利君：《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兰州学刊》2023年第4期。

⑨ 李雪伟、王瑛：《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韧性研究：回顾与展望》，《城市问题》2021年第7期。

⑩ 徐尚昆：《社会转型、文化制度二重性与信任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⑪ 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 *Poetics*, vol. 12, no. 4, 1983, pp. 311-356.

⑫ Nan Lin,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5, no. 1, 1999, pp. 467-487.

⑬ Jiang Song and Junfeng Jiang, "Online Social Capital, Offline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 Evidence from China," *Health &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vol. 30, no. 4, 2022, pp. 1025-1036.

出结构、关系与认知三维解释框架：结构维度包括网络联系、网络配置和适当组织；认知维度包括共享代码、语言和叙事；关系维度包括信任、规范、义务和认同。^①其他相似研究也认为，社会资本的三维解释框架应包括网络结构、共享规范的关系以及共享信念的认知。^②著名学者罗伯特·D. 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提出关系网络、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经典解释框架^③，不少国内外学者以此构建指标体系并开展相应理论与实证研究。^④

在相关研究中，早期的分类研究按照结构层次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体性、群体性与集体性三种类型。其中，个体性社会资本主要分析个体行动者如何通过与他人或邻里的关系获得信息、观念和支持等资源；群体性社会资本主要关注社区志愿者、社团组织等团体的互动与关系建立^⑤；集体性社会资本主要探讨社区共同体如何发展、维持作为公共物品的社会资本，以及如何增进社会成员福祉。^⑥但也有研究认为，此种分类方式较为泛化，忽视了研究对象本身的特征与差异。故而，更为主流的分类标准则把社会资本分为黏合型和桥联型。黏合型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同质群体中的信任和互助关系，而桥联型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异质群体间的利益关系。^⑦同时，还存在基于共通性和特定性的社会资本分类方式，前者是指不同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的人联系在一起，后者则以具有相同背景为基准。^⑧在此基础上，有研究延伸出“链接型社会资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概念，将其定义为跨越权力梯度的群体中的尊重规范和信任网络^⑨，关注了社会资本中自上而下的非对称性。此外，也有研究关注到社会资本背景的异质性，赋予了社会资本概念以时代和技术特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社会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成为新趋势，已经形成了线上与线下的社会资本。所谓线上社会资本指的是互联网和社交软件背景下衍生的社会资本新形态。社交媒体改变了社区的交互形式，传统的“熟人社会”“地缘关系”模式发生松动，人际关系与互动规范被重塑。例如，疫情时期的团购微信群就是信息时代的新产物，即根据特定群体或组织延展出特殊的信任机制。^⑩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变化或许也未必会改变社会资本的本质特征与结构形态。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资本的概念内涵受不同学科和理论视角的影响，这些研究试图通过分类和再界定来重新明确社会资本的概念与性质，以实施统一的研究计划，从而推动社会资本的发展与应用。

（二）社会资本的理论应用

对于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而言，社会资本是时髦和实用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中。著名学者帕特南就关注了意大利的“公民性”与经济发展绩效、政治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资本具有组织特征，可促进社会互利行动和合作。^⑪詹姆斯·S. 科尔曼

① Janine Nahapiet and Sumantra Ghoshal,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3, no. 2, 1998, pp. 242-266.

② Paul S. Adler and Seok-Woo Kwon, "Social Capital: 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7, no. 1, 2002, pp. 17-40.

③ 罗伯特·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0—201页。

④ 吴晓燕、关庆华：《“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流失与重构》，《求实》2015年第8期；苗红娜：《社会资本研究：分类与测量》，《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⑤ 毛佩瑾、徐正、邓国胜：《不同类型社区社会组织对社会资本形成的影响》，《城市问题》2017年第4期。

⑥ 方亚琴、夏建中：《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⑦ 约瑟·阿提拉诺·派纳·洛佩兹、约瑟·曼纽尔·桑切斯·桑托斯：《腐败的社会根源——文化与社会资本的影响》，《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4期。

⑧ 陈捷、卢春龙：《共通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中国的城市基层治理》。

⑨ Simon Szreter, "The State of Social Capital: Bringing Back in Power, Politics, and Histor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31, no. 5, 2002, pp. 573-621.

⑩ 易若彤：《差序格局与信任困境：疫情之下社区团购志愿者与居民的关系建构》，《传媒观察》2022年第5期；慕羽：《广场舞女性参与者的社会身份议题——从“差序格局”到“公共意识”的建立》，《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⑪ Robert D. Putnam,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The American Prospect*, vol. 4, no. 13, 1993, pp. 35-42.

(James S. Coleman) 认为社会资本同其他资本一样具有生产特质, 能促进公司或个体行动, 并分析了其在理性选择和集体行为等经济研究中的应用。^①可以说, 社会资本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能够促进不同学科之间观点的联结, 为政治制度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解释。^②

近年来, 社会资本在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应用愈发增多, 而诸如社会资本对制度发展、民主支持、政治信任、权力控制、社会关系、公众参与和社区建设有显著影响等理论命题被广泛接受。比如, 在社会治理及公众参与领域, 社会资本与居民的归属感和满意度密切相关。不少研究指出社会资本在凝聚人心以及增加社区融入感、满意度等方面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影响着社区公共生活质量(包括解决贫困等)。^③社会资本也影响着政治参与及合作。社会资本能提高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包括选举、投票、捐赠等)的意愿、频率和水平。^④况且, 社会资本能有效应对集体合作的困境, 防止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并推动公共利益最大化。^⑤另外, 社会资本有助于增强防范风险、应对危机的能力。社会资本能提供具有持续性、适应性、转变性、稳定性的恢复能力, 在抵御风险、危机应急、灾后恢复和贫困应对等韧性建设环节上发挥重要功能。^⑥此外, 社会资本还能通过社会网络建构与社区集体行动链接各种资源, 提升社区应对灾难的调节能力^⑦, 使社区能从各种风险冲击中获得相应的适应力和复原力。^⑧当然, 社会资本也是提升基层治理绩效的重要策略。积累社会资本能为国家治理提供和谐、有序、稳定的社会基础, 既能降低政府治理成本, 又能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可见, 这类研究把关系网络资源、互惠规范或信任关系等作为关键变量, 分析了其与社区治理效能的关系。^⑨

总之, 社会资本曾被视作解决政治发展、社会运作、组织建设和个体行动弊病的“灵丹妙药”, 研究的重心在于如何推动理论向实践的转化。然而, 社会资本的来源仍是一个具有模糊性和争议性的研究领域。^⑩有研究提出, 社会资本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但政府可能不适合这项任务。^⑪实际上, 该问题既是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前提, 也直接影响着社会资本效用的发挥。

(三) 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关于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与中国化运作, 既有研究主要从居民自治、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等视角切入。居民自治视角关注的是一种自发型社会资本, 是居民或社会组织根据需求在互动中自发形成的。前述的共通性与特定性资本、个体性与邻里性资本、黏合型和桥联型资本都是按照此衡量标准进行的分类。其中, 共通性社会资本是指居民之间彼此形成包容、开放的社会信任与网络, 特定性社会资本则指居民之间自发形成的局限、封闭信任与网络关系。这类研究普遍认为社会资本源于社会个体或组织的自发互动, 由社会自治力量驱动形成社会互动、社会参与及共同体规范等, 有着同质、平等、频繁与小规模特性。可见, 这类研究侧重于微观层面的个体特征, 包含年龄、性别、是否土著、受教育程度、职业分布与家庭收入等。例如, 社区内老年人数量多, 社会资本存量也会增加, 这是因为提升了总体空闲时间, 从而增加了相互交流的频率; 又如, 本地村民多, 社会资本总量就会提升, 这主要

① James S. Colema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4, 1988, pp. 95-120; 詹姆斯·S.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 邓方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 第354—356页。

② Frane Adam and Borut Rončević, "Social Capital: Recent Debates and Research Trend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42, no. 2, 2003, pp. 156-183.

③ 王晓莹、刘林平:《黏合性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罗家德、秦朗、方震平:《社会资本对村民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基于2012年汶川震后调查数据的分析》,《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④ 应优优:《公众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城乡差异——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4期。

⑤ 张诚:《培育社会资本: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方向与路径》,《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⑥ 蒋光明:《流行病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吗?——基于国家能力的调节效应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22年第3期。

⑦ 吴晓林、谢伊云:《基于城市公共安全的韧性社区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⑧ 吴莹:《社区社会资本与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效能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⑨ 陈捷、呼和·那日松、卢春龙:《社会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效应的因果机制》,《社会》2011年第6期。

⑩ Frane Adam and Borut Rončević, "Social Capital: Recent Debates and Research Trends."

⑪ Loïc J. D. Wacquant, "Negative Social Capital: State Breakdown and Social Destitution in America's Urban Cor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vol. 13, no. 1, 1998, pp. 25-40.

缘于熟人社会这一因素。^①有研究分析了包括社区的基本情况、客观条件等物理性条件的作用,认为具有社会性的基础设施、公共空间有助于形成持久性、经常性的社会互动,是社会资本得以发展的条件。^②也有研究认为,个体的认知、理念或诉求等是培育社会资本的内生动力,如有无归属感、有无互助需求和共同目标等。因为,共同的压力或危机会强化群体的互助需求,有助于激活社会资本。^③

政治制度视角则关注一个社会中社会资本得以产生和维持的制度和权力因素,分析了政治制度和权力关系等影响因素,并相应提炼出权力性资本、治理性资本、制度性资本等分析要素^④,突出了国家权力纵向介入的特征。这些研究也存在观点分歧:一种观点较为强调国家建构和党政主导的作用,认为横向自治与网络互动关系会被纵向行政吸纳或建制,国家会对社会进行统合,党政力量直接介入或干预社会资源供给,以实现合法性建构。^⑤如有研究提出“政党-国家-社会”研究范式,强调政党整合社会后会建立权力性资本,通过组织化、项目化和精英化动员方式引领基层社区建设。^⑥社会互动由此形成对制度和权力的依附嵌入关系,基层公共事务治理则在行政网络中展开。^⑦这种连接性社会资本反映的是一种垂直关系网络,同地方政府及相关权威管理机构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生成了特殊的信任关系。^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协同关系,社会资本既非纯社会中心导向,也非纯国家建制,而是会嵌入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的协同状态中。有研究指出,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中,党是社区多元主体的领导力量,政府则作为触手参与社区规划和完善基层自治制度,以实现多方参与社会协同。^⑨基于社会资本视域,有研究建构了应急物资储备的政企协同管理模式,要求通过协调社会网络关系等来培育社会资本。^⑩这些研究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资源交换和互惠关系,要求拓宽和创新政府、市场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协同方式。^⑪

社会结构视角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宏观社会结构中,受不同的社会文化、习俗和角色等影响。^⑫如有研究指出隐藏于小区内的单位文化所形成的社区社会资本,能使社区行动拥有更多的社区资源。^⑬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有着特殊的社会文化特征与社会结构差异。如传统的乡土社会在空间上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在社会文化上有深刻的人情关系基因。^⑭根据社群文化差异,有研究将社会资本划为“一盘散沙”“精英联合”“山头林立”“精诚团结”等不同类型,尝试建立本土化社会资本理论体系。^⑮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到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如有研究基于长时段历时性调查,建构了中国市

① 赵聚军、张雪莉:《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居民参与与基层管理体制优化——基于四个异质性小区的调查》,《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3期。

② 郑晓华、余成龙:《从服务到自治:社会性基础设施何以增能基层自治?——基于上海社区治理创新的经验观察》,《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③ 张其伟:《应急性社区社会资本生成机制及其常态化路径——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的案例研究》,《求实》2023年第3期。

④ 李诗隽、王德新:《社会资本视域下新时代多元化社区治理模式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⑤ 王磊:《国家策略中的社会资本生长逻辑——基于环境治理的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7年第4期。

⑥ 潘泽泉、辛星:《政党整合社会: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的中国实践》,《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⑦ 陈鹏:《城市社区治理:基本模式及其治理绩效——以四个商品房社区为例》,《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

⑧ 董茜、邓毅、高燕、詹丽:《中国国家公园的社区共管模式特征及管理分类——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环境保护》2019年第24期。

⑨ 蔡禾、黄晓星:《城市社区二重性及其治理》,《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⑩ 樊博、姜美全:《社会资本视域下政企协同的应急物资储备探究》,《理论探讨》2023年第2期。

⑪ 程秀英、孙柏瑛:《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治理中的制度设计再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4期。

⑫ 边恕、纪晓晨:《社会资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23年第1期。

⑬ 李东泉、王瑛:《单位“隐形在场”对社区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以广州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21年第4期。

⑭ 刘津:《人情关系的结构转型、性质转向与社会资本培育》,《理论月刊》2021年第6期。

⑮ 尉建文、陆凝峰、韩杨:《差序格局、圈子现象与社群社会资本》,《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4期。

市场化背景下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动态模型，认为随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社会资本呈现出阶段性特征。^①也有研究以少数民族为例，认为社会资本建立在一定的道德规范、伦理秩序、文化风俗和价值理念上，随着内外圈层的交往互动，社会结构面临新调整，社会资本也会被重塑。^②上述研究表明，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与中国人的行为模式^③，以此界定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资本理论。

（四）研究评述

关于社会资本研究已形成了不少理论成果，为本研究分析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启示。但社会资本的中国研究应有新的理论观照，具体如下：

一是社会资本的应用前提有待更新。既有的社会资本概念是基于西方的制度与社会背景产生的概念。尽管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产生与发展会受制度、结构的影响，建议关注中国的制度因素和文化环境，但这类讨论并未关注国家力量与社会文化等关键因素的影响及其作用方式。^④如在分析制度与权力的影响时，并没有将社会资本嵌入特定的政治发展框架中对制度和权力如何影响社会资本进行解释。社会中心论视角忽视了“制度”“政策”“权力”等国家要素，而国家中心论视角又过度强调国家要素的作用。正因如此，“国家-社会”协同论视角逐渐受到关注。然而，国家介入社会资本的作用方式如何，社会资本有哪些新变化与新特征，这些均有待深入研究。此外，既有研究也未将社会资本嵌入特定的文化框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为何会对社会资本产生影响进行解释。中国有着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社会资本中的差序关系、差序信任与差序规范，体现了专属于中国人的行为与习惯特色。因此，需要立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特性来理解社会资本的概念内涵，分析社会资本的新变化和新发展。

二是社会资本的衡量维度与分析要素有待调整。如前所述，学界关于社会资本的界定至今争议不断。正是概念内涵的模糊性对社会资本衡量维度的确立产生了影响，不同的划分标准也导致了社会资本衡量维度的差异。因此，这就需要将社会资本概念置于中国场景、中国文化加以重新考量，将权力因素、文化因素等都纳入相关分析，从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本理论体系，并以此推进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

三、理论基础：后发展国家与差序社会

（一）后发展理论中的国家元素

作为西方经典的政治学理论分支，现代化理论认为强有力的社会结构是现代化的重要机制，也是国家发展的动力来源。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但民众的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及社会经济地位则分化明显。与此同时，民众对自由、平等和参与等有了更高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国家的建立。^⑤然而，现代化理论体现的是早期工业国的自发模式，其中的“社会形态”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以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为代表的学者提出质疑，首次提出了“后发展”概念^⑥，认为后发展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完全不同的，所选择的是国家导向的发展与建设模式。

这些后发展国家缺少成熟的公民社会，社会自组织能力相对较弱。并且，在全球高速发展的浪潮中，这些国家还面临外部严峻的国际政治形势与内部紧迫的政治经济变革压力，必须以举国之力在短时间内解决来自政治、经济、技术、资源等的结构性困境，从而争取发展机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如何促进经济繁荣与发展生产力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心。为了创造高速发展的“奇迹”，国家也扮演着企业家角色，要推动市场创新与贸易合作。^⑦这就要求政党必须有超强的规划与动员能力^⑧，能自上而下

① 边燕杰、郭小弦、李晓光：《市场化与社会资本的变迁：1999—2014》。

② 史诗悦：《社会资本视角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研究——基于义乌的考察》，《回族研究》2021年第4期。

③ 尉建文、赵延东：《权力还是声望？——社会资本测量的争论与验证》，《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

④ 徐尚昆：《社会转型、文化制度二重性与信任重建》。

⑤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郭为桂、林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45页。

⑥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1—16页。

⑦ Seo-Young Cho, “Social Capital and Innovation in East Asia,”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8, no. 1, 2021, pp. 207–238.

⑧ 郁建兴、刘涛：《超越发展型国家与福利国家的共同富裕治理体系》，《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5期。

推动社会创新变革，由此集体意识与国家目标也就自然地超越了个体之间的自发规范与行动。这也意味着，社会自治与民众自发不再是唯一的决定性要素，后发展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等学者对此作了更加具体的理论阐释，其在传统的“国家-社会”协同理论基础提出了“国家嵌入”概念，认为在后发展国家中国家干预和私人合作并非零和博弈关系，社会资本也不只存在于公民社会，这种嵌入式社会资本才是国家成功的关键因素。政府既有自主性特征，又深深嵌入社会网络结构之中。国家与社会的紧密联结为国家的目标调适与政策协商提供了制度化渠道，这是发展中国国家经济转型成功的根本原因。在具体分工上，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公共宣传嵌入社会，营造一个促进公民参与的环境，组织公众参与公共服务，帮助形成新的信任体系和社会共同体；而社会力量也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互补支撑，最终实现共治效果。^①乔尔·S. 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提出“社会中的国家”的概念，同样印证了二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以相互形塑来改变各自的结构、目标和规则，社会的合作互动不会脱离于国家。^②因此，分析国家的不同部分如何联结和影响社会的不同部分才是更重要的议题。^③当政府计划建立一个具有便利性、参与性的制度结构，让行动者成为合作伙伴，这在促进社会资本发展上非常有效。^④这些后发展国家缺少成熟的公民社会与健全的市场机制，如果想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启用国家机器，高度依赖政府层级权力的引导与规制作用。

中国作为典型的后发展现代化国家，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变革中，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起着主导作用。国家力量介入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而社会运作也深刻嵌入权威体制下的制度结构。^⑤有研究指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依附、服务、分工等不同形式，但双重赋权、分类控制和行政吸纳等治理逻辑始终萦绕其中。^⑥国家不但主导着市场经济改革，也塑造了民众的政治态度与参与行为，包括对国家和政党的支持与信任。^⑦国家创制的社会空间是政社互动的舞台^⑧，民众的认知态度、社交关系与价值规范深受影响。如在国家所有制下，政府官员可能会拥有更多的资源、信息与权力。有研究指出，同政府的联系越紧密，越可能带来更多的便利或利益，这便生成了特殊的政治关系资本。^⑨相较于个体信任，共享的价值规范和制度信任在建立共同目标和促进经济发展中有更关键的作用。

不同于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零和特征^⑩，中国社会同国家共享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等益处，国家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社会资本的中国化运作势必会有国家干预，而探讨国家如何作用于社会资本则是中国式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此，国家力量介入势必会影响到社会资本，包括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等不同要素。

（二）传统文化下的差序观念

文化是影响人类意识、精神及行为的重要因素，其浓缩了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社会文化一旦形成，就以言传身教或默认可俗的方式迅速扩散，并实现代际传递与自我增量^⑪，在更大的

① Peter Evans, "Government Action, 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Reviewing the Evidence on Synergy," *World Development*, vol. 24, no. 6, 1996, pp. 1119-1132.

② 乔尔·S. 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阳、郭一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9—65页。

③ 高原：《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的演进：基于“社会中的国家”视角》，《东南学术》2023年第3期。

④ Mildred Warner, "Social Capital Construc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Rural Sociology*, vol. 64, no. 3, 1999, pp. 373-393.

⑤ 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⑥ 徐家良、季曦：《社会组织自主性与政府形塑——基于行业协会商会改革的政社关系阐释》，《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4期。

⑦ Jie Chen, *A Middle Class Without Democracy: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5.

⑧ 郁建兴、关爽：《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进展》，《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2期。

⑨ Hongjuan Zhang, Rong Han, Liang Wang and Runhui Lin, "Social Capital in China: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 vol. 20, 2021, pp. 32-77.

⑩ 汪锦军：《合作治理的构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生成机制》，《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4期。

⑪ 张会芸：《社会资本的文化主义转向及其困境——以罗伯特·帕特南的理论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层面形成稳固的文化体系，从而形成对社会行为的价值参照与约束效力。^①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民的态度及行为，这种社会影响是长期的、稳定的。^②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等指出，大部分人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部分的社会化，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还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类型文化产生的政治影响。^③帕特南在观察意大利南北部地区的公民文化传统时提出，社会文化是影响制度绩效差异的关键要素，二者存在着强相关关系。因为，公民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直接影响着社会资本，包括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参与）、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社会团结与信任等。^④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所在，每个国家与民族都沿着自身文化轨迹前行。塞缪尔·P.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指出，根据宗教及文化传统，世界应分为不同文明社会，不同文明之间有着差异化的价值与观念。^⑤例如，不同于尊崇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⑥，中国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文化路径^⑦，有着鲜明的家庭、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等特征。^⑧费孝通曾以“差序格局”理论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⑨社会格局更像是把石头丢在水面后所形成的一圈圈外推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⑩其中，“石头”是指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它基于成员间的血统、婚姻上的联系而形成。受小农经济农业文明的影响，中国的血缘关系得以长期延续并能以新的形式延展。显然，血缘关系的延展涉及地缘关系，地缘关系也被视为“血缘化的地缘”，由基于成员空间或地理位置上的邻近而形成的群体所构成。尽管随着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有研究提出业缘、趣缘等具有文化导向的论述。^⑪但血缘和地缘仍是形成传统熟人交往关系的基础^⑫，在社会的互动交往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自传统社会以来，中国便是“二人”社会，人在社会关系建构中体现价值，人的态度与行为受这种关系模式影响。例如，很少有人能真正实现独立于他人的超脱生活，“孤寡”等通常被社会视为不好。所谓熟人好办事，即熟人社会中大家按照“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来处事，“自己人”之间的互信、互助则理所当然。这种社会网络关系与互信互助模式，就是按照最基本的家族血缘和乡土地缘来维系的。例如，每逢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之时，邻里之间就自觉、自发地互帮互助。但一旦走出熟人圈或关系网，就开始按照亲疏有别原则来确认社会关系。并且，“信”是中国文化中一项非常重要的道德约束与社会规范，其通过建立精神激励或道德谴责来引导各种行为，是中国社会资本的特殊组成部分。^⑬成为一个可信赖的人，意味着其符合所处社会的道德标准，这有助于不同个体建立互惠互利关系。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深刻根植于并塑造着社会的交往活动。在此背景下，社会资本的中国化运作必然蕴涵传统文化底色，探讨文化如何作用于社会资本则是中国特色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重要支撑。因此，传统文化中的差序理念影响着社会资本，包括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等。

① 何哲：《公共治理：文化为什么是重要的？——兼论中西文化特质差异对公共治理的影响》，《中国行政管理》2022年第8期。

② 小G. 宾厄姆·鲍威尔、拉塞尔·J. 多尔顿、卡雷·斯特罗姆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杨红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1—59页。

③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詹姆斯·S. 科尔曼等：《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任晓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26页。

④ 罗伯特·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第202页。

⑤ 塞缪尔·P.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第5—7页。

⑥ 罗伯特·D. 帕特南：《独自打保龄》，刘波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13页。

⑦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1—161页。

⑧ 翟学伟：《是“关系”，还是社会资本》，《社会》2009年第1期。

⑨ 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⑩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7页。

⑪ 郭星华、朱涛：《信缘：数字时代的新型社会关系》，《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6期。

⑫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13—124页。

⑬ 何哲：《公共治理：文化为什么是重要的？——兼论中西文化特质差异对公共治理的影响》。

四、国家嵌入与文化塑造：社会资本的中国化

中国有特殊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特征，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内嵌于这一制度和结构。国家力量通过制度设计、组织动员与思想引领等介入并塑造了社会资本的纵向特征，传统文化则以血缘为核心、以地缘为纽带影响并生成了社会资本的差序特征，丰富了社会资本中关系网络、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的内涵。这就需要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解析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特征，发展并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资本理论体系（如图1所示），深入分析社会资本的中国化运作逻辑，即国家力量与社会文化是缘何、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力量的干预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社会资本中仍然存在横向的互动力量与关系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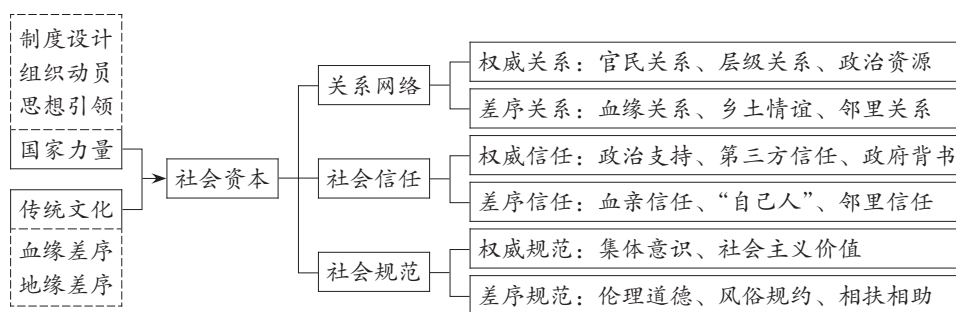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特色社会资本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资本关系网络

1. 权威关系。国家力量介入社会资本关系网络，生成了以政党权威为纽带的新关系。不同于民众自发形成的互动关系网络，这种新型关系网络带有“纵向”的政治印痕，存在非对称性，是国家自上而下介入社会交往所形成的。^①

在中国，社会自组织能力较弱且民众互动程度偏低，国家则有强大的组织规划与社会动员能力，掌握并配置关键政策资源。^②为提高参与合作水平，政府部门会设法增加民众的交往、互动机会，包括通过政策制定直接或间接地引导民众或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况且，社会交往也会对官员关系与政府资源产生黏性。

一方面，政府提供一套规范化、多层次的制度安排，调整社会交往的环境、空间与能力。^③这些制度是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在基层的延伸，既包括有调控、指示功能的专项规划与公共政策，也涵盖有管理和操作功能的文件规定、专门项目及合作协议等，目的在于通过政府公权力引领、促进互利行动与良性合作，以此重塑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例如，《“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规划建设规划》明确提出，截至2025年城乡社区服务与建设的指标与要求，且具体到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居民拥有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面积及活动区域面积占比等指标。这类规划内容对城乡基层的建设与治理提出了明确的权利义务约定，对公共活动场地，公共设施等内容作出强制性要求，就是要为民众创造交流互动的机会，促进公共活动的开展。在此规划之外，政府部门还出台一系列保障性、激励性和倡导性公共政策，支持社区组织建设，激励民众参与社会活动与公益事业，建立互助友爱的互动关系网络。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官员介入和资源供给重塑社会关系网络，为个体、集体之间的互动交往注入力量。官员介入指的是基层干部直接采取动员或服务等方式帮助民众建立持久、良性的互动网络关系。例如，为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服务组织能力，社区实现了基层党建全覆盖和政府工作网格化，形成了多层

① 刘欣、田丰：《城市基层党建与社区社会资本生成——基层社区党建的延展效应》，《学术月刊》2021年第6期。

② 蒋光明：《流行病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吗？——基于国家能力的调节效应分析》；赵小平、毛佩瑾：《公益领域中的“市场运作”：社会组织建构社区社会资本的机制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11期。

③ 方亚琴、夏建中：《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

次、全方位的组织体系。一些社区干部会用自身的资源、关系和影响力帮助民众建立联系，有的领导者本就兼任其他重要职务，能够链接体制内外的广泛人脉和资源^①，能有效解决民众之间的矛盾和问题。由此，党政组织直接承担了关系链接、社会协调等重要责任，包括扶持培育社会组织、开展专项工作、组织社区群众性活动等。资源供给则指政府部门通过提供间接的附加性、专业性服务，以及直接保障相应的人员、活动经费、场地空间等，为社会组织的成长与社会参与的培育提供资源保障。如前所述，政府部门往往是在财政、用地规划上为社区民众提供共同活动所需的场所、设施、娱乐和休闲空间，通过提供资金和培训等资源扶持社区组织和社区志愿者，为民众提供更多的社交和服务计划。

总之，国家力量通过制度设计、组织动员、思想引领等介入民众社交网络，促进和保障民众之间的交流互动，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关系、组织关系也嵌入社会关系中。尤其是，当社区行动得到更高一级官员的关注或认同，就有得到更广泛、更持久支持的可能。为此，国家力量在引导社会交互时，人们也依赖于这种关系，往往在常规社交网络之外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寻找更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关系。

2. 差序关系。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着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塑造了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差序关系。区别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呈现“差序”特征，包括以血缘观念为核心的血亲关系和受地缘观念影响的乡土情谊及邻里关系。

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基础由血缘和地缘所构成，其他关系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延伸出来的。^②根据差序格局理论，这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运作模式，所推出的“波纹”为个人的社会关系，“一圈圈波纹”则为层层叠叠的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③这种差序格局塑造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分层，生成了由熟人关系组合而成的“强关系”和由生人关系组合而成的“弱关系”。^④

其中，血缘关系作为一种先天的、捆绑式的血亲关系，是一种“强关系”形式。^⑤通常情况下，这种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父辈、子辈、夫妻、宗族、家族等形式。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男系血缘（父系家族）通常处于核心位置，用以体现与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并且，受小农经济农业文明的影响，以血亲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模式得以长期延续。可以说，相较于西方的“天赋人权”，中国社会更为信奉“祖赋人权”。有研究发现，中国华南地区的城市村落中心仍然保留着供奉祖先的祠堂。^⑥另外，除核心血亲关系之外，中国社会中也形成了一种泛化血亲关系，又被称为拟血亲关系，表现为认同宗、认干亲、拜把子等关系形式。^⑦这两类关系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血亲关系网络，也决定了关系网络中成员的资格、身份、责任、权利和活动。

伴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受地缘观念影响的社会网络可分为传统的“乡土情谊”和现今的社区“邻里关系”。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结成的一个地方社群^⑧，这种纯粹的地缘关系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很难实现。在传统乡村社会，“生于斯，死于斯”的文化使得居住在同一地域的人常常有着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有研究发现，在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人的迁移轨迹表现出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链式流动”特征，如北京的“浙江村”等。^⑨这体现出了一“乡土情谊”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先天的“捆绑型”关系网络。例如，籍贯相同的人流动到不同的城市、国家，由此有了“同乡”“同胞”等说法，从而形成一种将彼此紧密联系的“血缘化的地缘”。另一种受地缘观念影响生成的关系则为“邻里关系”。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这种关系更加接近“纯粹的地缘”。

① 李东泉：《社会资本影响社区社会组织成长绩效的研究——以成都市肖家河街道为例》，《上海城市规划》2017年第2期。

② 尉建文、陆凝峰、韩杨：《差序格局、圈子现象与社群社会资本》。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37页。

④ 马克·格兰诺维特：《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张文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70—191页。

⑤ 翟学伟：《关系研究的多重立场与理论重构》，《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⑥ 徐勇：《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⑦ 杨宜音：《“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⑧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13—124页。

⑨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第409—415页。

（二）中国特色社会资本规范体系

1. 权威规范。国家介入影响着社会资本规范体系，确立了以党政权威为引领的新规范。这与西方社会公民的自发互助合作不同，国家要素嵌入了中国的社会规范体系，影响着社会规范的内容、特征和生成方式。当民众处于弱参与和弱合作的状态时，易陷入团结与合作的困境，从而制约美好社区与和谐社会的建设。^①为此，国家就要扮演积极的指导者与建设者角色，通过制度安排和思想引领规制社会民众的互动及社会组织的运作，确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社会规范体系，促使社会形成良性、有序的互动合作。

在制度安排上，国家凭借正式的法律制度与政策安排，形成自上而下的约束，引导着所有行动者的行为。例如，社区居民之间的参与是非制度化、非常规化及非政治化的^②，社区管理者则牵头建立了协商议事等常态化制度规则，在明晰部门之间权责分工和监督考核的同时，增加了对社区公共利益进行商讨和决策的可能，提供了提升社区居民参与能力的集体活动。此外，集中力量办大事一直是中国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政府可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确保社区中社会组织的规范运行，并高效、快速地激励民众参与，从而构建起强有力的社会资本规范体系，在提升社区民众认同感的同时，不断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和社区公共精神。

在思想的引领上，政府部门要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营造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氛围，引导社区民众做文明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例如，各部门要有侧重地开展有关养老服务、环境保护、文明倡导、互助帮扶等不同公益活动，从而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与此同时，通过大力扶持公益类社会组织来不断形塑公民精神，引导各类互助性社会组织借助互助、互惠活动建构社区良好邻里关系。总之，在集体性公益活动中，促使民众逐渐建立起广泛、包容的社会联结与合作，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社区规范，最终培育互助的公民精神和形成良性的互惠规范。^③

需要注意的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所有规则制定与活动开展的基本原则，不论是各类社会组织的运作，还是志愿公益活动的开展，都必须坚持这一核心价值理念。近年来，社会自组织团体活动愈发增多，而这类活动的实施规则通常由民众自主协商与制定，如广场舞、摄影爱好等。然而，这些活动并非纯自治的，而是有约束、有分寸和有红线的自治，同样是需要合乎于安全、稳定、和谐等价值观的。^④

2. 差序规范。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着社会资本规范体系，形成了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差序规范。如前所述，差序格局社会是一个由无数私人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网络，规范要素则附着在这张关系网络的每一个结之中，既包括受血缘观念影响的伦理道德、受地缘观念影响的风俗规约，还包括受血缘和地缘观念共同作用的“相扶相助”社会规范。

一方面，伦理道德是中国社会中血缘观念的重要体现。在中国伦理文化中，人们通常在家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规定伦理关系，进而界划道德义务。^⑤由于在中国传统经济中小农生产方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以孝为本的父系父权家庭制度一直被社会所强调，“忠、孝、悌、忍、善”的“五伦”关系准则主要以血缘为基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传统伦理都彰显了这种血缘观念。^⑥“伦”是一种集体主义行动规约，要求家庭成员遵循集体规范，进行不求回报的互惠行为，而破坏“伦”这种强大规范的人则会受到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谴责。^⑦与国家强制力不同，伦理道德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需要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用以维持社会的生存和绵续。^⑧受地缘因素影响，不同地区存

① 陈福平：《强市场中的“弱参与”：一个公民社会的考察路径》，《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② 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③ 毛佩瑾、徐正、邓国胜：《不同类型社区社会组织对社会资本形成的影响》。

④ 刘欣、田丰：《城市基层党建与社区社会资本生成——基层社区党建的延展效应》。

⑤ 彭海霞、李金和：《从血缘伦理到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的时代境遇》，《理论月刊》2015年第11期。

⑥ 侯东栋、王晓慧：《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从疏离到结缘——基于差序格局理论的分析》，《西北人口》2018年第1期。

⑦ 罗家德：《关系与圈子——中国人工作场域中的圈子现象》，《管理学报》2012年第2期。

⑧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48页。

在相应的风俗规约，这都是经过长期生产劳动与生活实践后所形成的。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些风俗为当地居民的衣、食、住、行、婚丧、节庆和礼仪等活动提供了指引与约束，是基于地域自发产生的社会规范，具有浓厚的地方生活实践色彩。^①

另一方面，“相扶相助”的社会规范是由血缘、地缘观念共同作用而产生的。首先，基于“血缘”，家人之间的相互扶持、相互帮助常为传统。可以说，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相互之间通常具有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互惠的优先性和必要性^②，家庭血亲关系则成为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的核心支撑。在遭遇困难、危机时，人们通常更倾向于求助“自己人”，优先考虑家人，其次为亲戚或朋友同学。^③其次，基于“地缘”，社会成员之间往往形成老乡或邻里关系，本质上也是建构了一种“相扶相助”的社会规范。

（三）中国特色社会资本信任体系

1. 权威信任。国家介入影响社会资本信任体系，形成了以党政权威为背书的新信任关系。与社会民众之间自发形成的信任关系不同，国家要素自上而下介入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以政府权威为导向的第三方信任关系，为社会交往搭建了新的信任桥梁。

在日常生活中，社会民众之间会存在关系疏离、情感淡薄与信任缺失等问题，而党和政府一直在建构和维系社会信任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党政权力是影响社会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具有较高的合法性、权威性与社会责任，拥有良好的治理信誉与形象。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公共利益保障和社会稳定维护时，也增强了社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能够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与发展。在此过程中，政府会通过特定的制度设计和组织动员方式促进社会信任机制的建构。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等都是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纲领。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统筹发展与安全中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人民群众真实感受到政府的治理实效和服务质量，这不仅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而且有助于建构良好的社会信任体系。例如，各地基层政府还会通过建立和实施民主议事协商、居民代表大会、矛盾调解、信息公开等具体管理制度，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互动和理解，这既有助于强化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也能让其了解社区的运作和决策过程，增加对社区、政府部门的信任。再如，社区干部直接帮助居民解决矛盾纠纷，通过协调社区居民利益关系增加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与信任。

此外，党和政府还发挥着思想引领作用，统筹借助宣传教育等来提高社会民众素质，增强民众之间及其对政府的信任。随着城市空间结构不断转型，社区已出现“职住分离”“朝九晚五”等问题，影响着社区居民间的信任关系。但社区居民往往会基于对居委会、党政工作者的信任，而参加由政府组织的公共活动。所以，政府部门非常重视基层社区共建活动，往往借此通过党建宣传和组织动员来凝聚群众力量，引导民众参与公益事业和社区服务，在增加民众之间交流合作的同时，不断提升社区的凝聚力和信任感。可以说，社区民众则是基于对党和政府权威的信任而寄予某种期望^④，愿意信赖、支持并参与社区工作和公共活动，从而重塑了社区信任关系。

2. 差序信任。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着社会资本信任体系，形成了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差序信任。正因如此，中国形成了以“差序格局”为特征信任结构^⑤，具有较为明显的乡土性，呈现出明确的血缘、地缘取向，包括受血缘观念影响的血亲信任，以及受地缘观念影响的同乡、邻里信任。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存在着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人们习惯按照关系的远近亲疏划分“自己人”和“外人”，推崇“圈子文化”和“人情文化”。^⑥基于血缘、地缘观念形成的熟人社会，各成员之间互为

① 陈寒非：《风俗与法律：村规民约促进移风易俗的方式与逻辑》，《学术交流》2017年第5期。

② 李汉宗：《血缘、地缘、业缘：新市民的社会关系转型》，《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③ 陈福平、黎熙元：《当代社区的两种空间：地域与社会网络》，《社会》2008年第5期；张雪霖：《城市社区邻里关系性质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6期。

④ 傅广宛、郭建文：《基层社会矛盾的化解：差序政府信任格局的解构与重塑——以GZ省JP县为个案》，《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⑤ 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胡荣、李静雅：《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社会》2006年第6期。

⑥ 聂建亮、唐乐：《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农村老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自己人”，相互之间有着中国社会中常见的最高水平的信任关系。^①以血缘为基础，中国人相互之间的信任是一种“血亲本位”的信任，主要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以宗族共同体为纽带的信任。^②

与此同时，地缘是建构中国社会信任关系和影响中国社会信任结构的另一内在机制。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如果这些社会成员已经具备群体认同的基础，相互之间就更容易建立更高水平的信任关系。“老乡”“邻里”即为群体认同的一种。以群体认同为基础，这些群体中成员彼此间的地缘身份往往就是建构高水平社会信任关系的关键。或者说，在一般情景下，不同个体彼此产生联系后才有产生信任的可能，陌生人之间往往只存在较低水平的信任关系。所以，当不同的人之间存在地缘联系，那么双方就有可能在没有互动关系的情况下，也能够建立起以地缘观念为基础的社会信任。^③

五、结论与讨论

在西方国家，社会往往致力于建构起自由、开放的社区互助网络和社区自治空间。但是，中国作为典型的后发展现代化国家，国家与社会之间是非对称性权力关系，社会发展有着明显的国家干预和调控特征。与此同时，中国特殊的传统文化也深刻影响着社会民众的交互行为与社会关系。因此，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社会资本理论来回应和解释中国问题，这就需要加快建构中国特色社会资本理论体系。

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中，社会资本出现了新发展与新变化，这就需要立足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来建构新的理论范式。一方面，国家力量通过制度设计、组织动员与思想引领等方式介入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重新激发和塑造着社会资本，形成了以党政权力为纽带的权威关系、权威信任与权威规范，体现为一种纵向调控下的社会互动、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地塑造、丰富社会资本的内涵与特征，通过以血缘为核心、以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塑造出了社会资本中的差序关系、差序信任与差序规范，体现为一种专属于中国人的血缘与地缘特色。

随着社会资本理论被引入中国，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理论范式被应用于中国的不同治理场景，也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知识。事实上，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创造不仅有助于激发社会自组织力量，推动社会融合与基层共同体建设，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民众之间互动、互信、共建和共治。可以说，社会资本是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中不能忽视的关键要素，但对于社会资本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而言，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国家发展与社会成长都必须依托一个有为、有效的强大政府，需要其自上而下地提供制度、组织、资源、服务等方面的支持，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与此同时，中国还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差序格局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社会运作和社会关系，这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因此，这就需要立足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解析中国式社会资本的理论内涵与作用逻辑。本文旨在转变既有社会资本研究范式，将研究焦点引至社会资本的中国化理论构建与实践运用，为推动社会资本理论的中国化、本土化发展提供理论铺垫。

（责任编辑：陈 果）

① 向楠、乐章：《非农就业与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基于福山命题的实证考察》，《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②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193页。

③ 罗家德、王竞：《圈子理论——以社会网的视角分析中国人的组织行为》，《战略管理》2010年第1期。